

明中葉知識體系建構的多元取向： 從李夢陽〈刻《戰國策》序〉談起[▲]

王昌偉*

摘要

嘉靖 2 年（1523），巡按河南的王濬（生卒年不詳）打算刊刻《戰國策》，為此特別請文學復古運動的領導者李夢陽（1473-1530）作序。通過對序文及李夢陽相關著作的細讀，本文旨在說明，從表面看來，李夢陽似乎是以衛道之士的口吻，通過作序的方式批判《戰國策》為畔經離道之書，事實上這篇序文實含有多重視角。要理解李夢陽這篇序文的學術思想史意義，我們必須把它放置在明中葉以還「雜學」或諸子學興起的背景下考慮。跟宋代以來的理學家強調士人學術應該統一在宏大和具普遍意義的「道」之下的傾向不同，明中葉以後的思想家對世界的理解，則是以多元和分別為基礎，強調萬物的分殊和差異。本文將說明，李夢陽序《戰國策》的多重視角，正反映了明代中葉知識界重視多元性和差異性多於普遍性的特點。

關鍵詞：李夢陽、〈刻《戰國策》序〉、多重視角、普遍性、差異性

[▲] 本文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以及研究助理周永蕙小姐和黃佳雯小姐的辛勤勞作，一併致謝。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嘉靖 2 年（1523），巡按河南的王濬（生卒年不詳）打算刊刻《戰國策》，為此特別請當時被謫官而居於故鄉的文學復古運動的領導者李夢陽（1473-1530）作序。茲引全文如下：

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
 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
 「錄往者跡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跡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
 「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跡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眚細眚，人詳物業，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俛，故曰跡事者該。而其為書也，立從橫，倡裨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為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矢見其險，謬，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躡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蹄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
 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
 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為戰國。」
 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駢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返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

者。」曾氏所謂「因以為戒」者也。¹

從表面看來，李夢陽似乎是以衛道之士的口吻，通過作序的方式批判《戰國策》為畔經離道之書。²事實上，正如黃卓越所言，李夢陽的這篇序文實含有多重視角，概括而言，可分為「君子」與「述者」兩種：「述者的視角偏於對史實的錄記，也就是史學的視角，而君子的視角則是由純儒立場出發的道德論的視角，它不是客觀地呈示複雜的歷史經驗（「該」），而是必然要對史實賦予善惡分疏的判斷。」³

要理解李夢陽這篇序文的學術思想史意義，我們必須把它放置在明中葉以還「雜學」或諸子學興起的背景下考慮。⁴明代官方通過科舉考試，把以程朱學派的詮釋為主的四書五經奉為經典，規定天下士子接受。諸子學在科舉的場域之外獲得比以往更多的重視，說明士人文化和視野正在經歷轉型。不過，所謂的轉型，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包弼德（Peter K. Bol）在一篇討論晚明學者胡應麟（1551-1602）的論文中指出，跟宋代以來的理學家強調士人學術應該統一在宏大和具普遍意義的「道」之下的傾向不同，胡應麟對世界的理解，則是以多元和分別為基礎，強調萬物的分殊和差異。在這樣的認識之下，胡應麟否認歷史上曾出現過一個政治、道德、文化和學術高度統一的黃金時代。在他看來，現實世界本來就是錯綜複雜的，要了解這樣的世界，人類知識也應該是駁雜和多元的，世間並不存在一種能夠解釋所有現象的學術，博學因此是重要的。⁵

胡應麟以及同時代的文學復古運動的推手，受到李夢陽和他的同道相當深刻的影響。如李夢陽的摯友王廷相（1474-1544）就曾針對理學家「理一」的說法而提出「理萬」的概念，藉此強調萬物之不齊。⁶本文將從〈刻《戰國策》序〉切入，以釐清李夢陽多重視角的實質內涵。本文也將說明，這樣的多重視角，實反映了明代中葉知識界重視多元性和差異性多於普遍性的特點。

二、李夢陽與程朱理學

¹ [明]李夢陽：〈刻《戰國策》序〉，《空同先生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刊本，1602），卷50，頁1下-3上。

² 有些讀者正是如此理解李夢陽的這篇序文。見郭丹：〈怎樣讀戰國策〉，《中華讀書報》第8版，2015年10月14日。

³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8-43。

⁴ 同前註，頁38-43。魏宗禹：〈明清時期諸子學研究簡論〉，《孔子研究》第3期（1998），頁93-101。

⁵ Peter K. Bol, "Looking to Wang Shizhen: Hu Yinglin (1551-1602) and Late Ming Alternatives to Neo-Confucian Learning," *Ming Studies*, 53 (2006): pp.99-137.

⁶ Ong Chang-woei, "The Principles Are Many: Wang Tingxiang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Mid-M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 (2006): pp.461-494.

要理解李夢陽在為《戰國策》作序時所呈現的「君子」與「述者」兩種視角，我們必須先分析他對程朱理學的看法。李夢陽晚年以語錄體的格式寫了《空同子》一書，根據他的年表的作者朱安淵（生卒年不詳）所言，李夢陽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閔聖遠言湮，異端橫起，理學亡傳，於是著《空同子》八篇」。⁷如此看來，《空同子》似乎是為了扶持正學，擯斥異端而作的。朱安淵也進一步把「聖言」等同於「理學」，認為李夢陽是以接續「理學」，重新彰顯「聖言」為己任。不過何謂「理學」？我們今天所謂的理學，一般指的是肇始於北宋周張二程，集大成於朱熹（1130-1200），並在元末明初發展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學術流派。朱安淵所謂的理學究竟為何，在缺乏其他材料說明的情況下，實難斷言。至於李夢陽，則從未使用過「理學」一詞，不過很明顯的，《空同子》一書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為了回應程朱理學而作的，但作者對理學的態度卻頗值得探究：

太宗時，鄱陽一老儒詆斥濂洛之學，上己所著書。上覽之大怒，閣臣楊士奇力營救，得不殺，遣人即其家，盡焚其所著書。空同子曰：「盛世之君有道哉！記曰：『一道德以同俗。』故異言亂政。」⁸

此處「鄱陽一老儒」指的是朱季友。其時明成祖正欲尊朱學，頒布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於天下，而朱季友因為不識時務，結果遭此橫禍。⁹李夢陽盛讚明成祖嚴懲朱季友，稱此舉唯有道之君能為之，顯示在奉程朱之學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問題上，他和官方立場一致。另一方面，從為政的層面而言，李夢陽卻對理學家是否真能治國平天下表示懷疑。《空同子》有一段論及「權」在治術中的重要性，同時指出漢儒與宋儒的政治思想的缺失：

又問漢儒。空同子曰：「反經無道。無道何權矣？聖人之權，輕重之以適中者也，非反之也。」問宋儒。曰：「宋儒不知孟子，又安知權？故心帝王之傳者必孔孟，心孔孟者必知權，可也。」曰：「若是，則宋儒得位，不興三代之治乎？」空同子曰：「吁！難言哉！周程其大矣。宋之開國者誰歟？致太平者誰歟？應變定傾者誰歟？固非斯人之流也。吁！難言哉！然周程其

⁷ [明]朱安淵：〈李空同先生年表〉，同註1，附錄1，頁13上。

⁸ 李夢陽：《空同子·治道》，同註1，卷65，頁24上下。

⁹ 朱季友事見[明]王直：〈楊文貞公傳〉，收入[明]焦竑編：《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卷12，頁28上。《空同子》中說朱季友為楊士奇（1364-1444）所救，但根據王直（1379-1462）的敘述，楊士奇在皇帝發怒的時候，只說「當盡毀所煮書，庶幾不誤後人」，而以朱季友年事已高向皇帝求情的是胡廣（1369-1418）。

大。」¹⁰

在李夢陽看來，「權」乃帝王之學最重要的一環，這點孔孟早已闡明。漢儒雖談權，但由於其學說離經叛道，因此所謂的權，絕不是聖人秉常道而行，「輕重之以適中」的權。另一方面，宋儒的學說雖不違背聖人之道，但由於他們誤以為孔孟不談權，因此完全無法領略孔孟帝王之學的真諦，所以儘管宋儒如周敦頤（1017-1073）、二程等是偉大的，但真要把政事託付於他們，恐怕他們也不一定能勝任。這當然是對宋儒的批評，但根據「然周程其大」這樣的論斷，我們或也可從另外一個角度詮釋李夢陽對宋儒的看法：儘管周程在帝王之學方面欠缺，卻不影響他們整體學術的正當性。換言之，帝王之學與道德性命之學是可以分開來討論和評價的。在理學傳統中，通過經筵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帝王之學，儘管對象是君主，但卻和針對一般人的修身之學沒有本質上的區別。¹¹李夢陽通過對「術」的論述把帝王之學獨立出來，其意義不僅僅是否定理學的帝王之學而已，實是對理學追求普遍和統一的學術取向的一種顛覆。

李夢陽從帝王之學的角度批評宋儒，在士人圈子所引起的反響不大，但他對宋儒的學術如何摧毀文章的觀點則廣泛被引用和討論：

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如畫焉，似而已矣。是故賢者不諱過，愚者不竊美。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故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或問：「何謂？」空同子曰：「嗟！宋儒言理不爛然歟？童稚能談焉。渠尚知性行有不必合邪？」¹²

這一段話經常被學者引用來說明李夢陽的反理學立場。李夢陽固然對宋儒有關「理」的理論有所不滿，才會說宋儒所論之理即便是童子也能談，但更為重要的，是李夢陽並沒有把問題完全歸咎於宋儒。「非宋儒廢之也，文者自廢之也」一句，把責任轉移到「文者」身上。宋儒談「理」、「道」固然有誤，但真正導致文章背離古文宗旨的，卻是源於今之「文者」忽略了現實人生美惡兼具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他們筆下的世界，單一、扁平，毫無神采，完全是因為他們一味迎合宋儒對道的論述，忘了宋儒所談的理與道，只是人類知識的一部分。李夢陽並非完全排斥談理論道的文章。實際上，《空同子》一

¹⁰ 李夢陽：《空同子·論學上》，同註1，卷66，頁6下-7上。

¹¹ 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8-29.

¹² 李夢陽：《空同子·論學上》，同註1，卷66，頁5上下。

書正是論道之文，但文章除了論道之外，還有其他的使命和功能，唯有把文章從宋儒所謂的「道理」的籠罩中解放出來，恢復其獨立性，才能重新建立文章的典範。

因此，無論是批評宋儒的帝王之學或是感歎今之文者盲目追求「合道」，李夢陽都是在試圖限制理學的普遍性論述，倡導士人學術的多元性。他這種強調多元的觀點，和他的理氣論是分不開的：

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玄鳥生商，武敏肇姬，尹之空桑，陳搏之肉搏，斯於理能推哉？空同子曰：「形化後有氣化焉。野屋之鼠，醯甕之雞，其類已。」¹³

宋人最大的缺失，就是以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可用理來解釋，而忽略了氣化流行中存在不規則與變異，比如一些帶有神秘色彩的現象如「玄鳥生商，武敏肇姬」等等，就不是能夠用一具有普遍意義的常理推斷的。李夢陽所謂「形化後有氣化」，更是直指周敦頤和朱熹的觀點。朱熹論氣化和形化之間的先後關係有如下意見：

始嘗推測人之身所以與天地陰陽交際處，而不得其說。既讀《太極圖說》，其中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竊謂交際處於此可見，然形化既定，雖不復氣化，而大化之流行接續，如川流之不息。凡飲食呼吸，皆是流通處。¹⁴

朱熹通過讀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悟出了人的形體與氣（陰陽）的變化之間親密微妙的關係。天地萬物由氣化得始其形體，之後的世界發展則是通過人與物自身的繁衍（形化）而生生不息。決定宇宙間氣化後有形化，以致大化流行，永不間斷的普遍規律的是太極，亦即是理。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不能違背這普遍的規律。李夢陽通過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某些無法以氣化而後有形化這一規律解釋的奇異事件，試圖證明宇宙的變化在「理」之外還存在不可測的空間。其根本目的，正在於指出理的局限性以及宇宙與人事的發展變化的複雜性和變異性。

正因為宇宙與人事的變化流行如此複雜和多元，我們就不可能，也不應該依據一套單一和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知識理論規範我們的行動。李夢陽對理學的批評，不在於全盤

¹³ 李夢陽：《空同子·物理》，同註1，卷65，頁11上下。

¹⁴ [宋]朱熹：〈答余國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徐德明、王鐵校點：《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62，頁3019。

推翻其中他認為符合正統的部分，而在於為理學以外，能幫助我們應對這複雜的世界的其他知識體系爭一席之地。以「權」為核心的帝王之學即是其中之一，以「述者」為中心的文章之學也是。

三、經典、史傳、文辭

以今天的標準衡量，《戰國策》自然是中華文明的經典之一，但自從成書以來，世人對此書的評價，大多集中於說明如此看似離經叛道之書，如何得以流傳或者應該流傳。¹⁵曾鞏（1019-1083）就因為此書記載戰國游士的言行，認為這些縱橫之士「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¹⁶

儘管如此，曾鞏還是積極求得全書並加以刊刻。他在序中借用問答的方式說明自己的用心：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¹⁷

在曾鞏看來，禁止邪說散佈的最佳途徑，不是粗暴地去銷毀登載相關的書籍，反而應該加以刊行，讓讀者自行發現其說不可行不可從的原因。另外，即便《戰國策》充斥著縱橫家的邪說，但其中還是保存了兩百多年的史實，單憑這一點，就不可得而廢了。

針對這類帶有強烈的道德審判色彩的標準，南宋初校註刊行《戰國策》的鮑彪有不同的看法。鮑氏認為，此書所載的一些人物事迹，「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

¹⁵ 有關《戰國策》自宋代以來各種版本的流傳情況，可參閱余慧君、高月英、盧芹娟：〈姚宏「剡川姚氏本戰國策」版本流傳述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8期（2005），頁59-62。

¹⁶ [宋]鮑彪註：〈曾序〉，《戰國策》（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戊子7年吳門龔雷覆〔宋〕刊本，1528），卷首，頁4上。

¹⁷ 同前註，卷首，頁4下-5上。

也」。更何況，他相信經過他整理和評論的版本，有「翊宣教化」的功能，也「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¹⁸這是一種把道德、政治與歷史知識和功能合而為一的觀點，與曾鞏分別對待的立場不同。

另外，還有人是從文字的角度評價《戰國策》的。此書現存某些明代以後流傳的刊本收有一篇署名「李文叔」的評論，¹⁹其中就說：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浸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²⁰

與曾鞏先從「君子」與「邪說」的對立抨擊《戰國策》，然後從保存史實的角度論其不可廢不同，這篇評論從聖人之道、史實與文章之間的關係立論，指出《戰國策》雖於歷史事實或聖人之道都不達標準，但其「文辭之勝」卻足以使人嚮往蘇秦、張儀等人的言說。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雖然以聖人之道為最高標準，但卻不對《戰國策》採取道德批判的立場，反而認為包括此書在內的諸子之文是聖人文章的餘緒，而對之加以肯定。

以上幾篇針對《戰國策》的論述，同樣可由前述黃卓越所總結出來的「君子」與「述者」的兩個視角概括，不過「述者」可再細分為史家與文章家兩類，前者重視史實的記錄、釐清和保存，後者則重視文辭的感染力。朱熹雖未曾專門為《戰國策》寫過文章，但《朱子語類》所記載他對此書的看法卻頗為特別：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

¹⁸ 同前註，卷首，頁2下。

¹⁹ [宋]李清照(1084-1155)之父李格非(熙寧9年[1076]進士)字文叔，後世學者多據此認為此篇出自李格非之手，但根據現存的線索，實難斷定李格非就是作者。此事經簡錦松教授提醒，特此致謝。

²⁰ 鮑彪註：〈李文叔書《戰國策》後〉，同註16，後序，頁1上-2下。

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²¹

《戰國策》的文字固然無法和六經相比，但卻高於《國語》，因其有「英偉氣」，而此氣勢和世運是相關聯的。錢穆認為，朱熹如此總結文章與世運的關係，是因為他堅信文道一致，此番見解「非深於文者不能知，尤非深於史者不能知，更非深於道者不能知」。換言之，朱熹對《戰國策》文字的批評，實源於他經學史學文學貫通合一的思想。²²

跟以上的幾種觀點比較，李夢陽的論述有其獨特之處，也更為複雜。例如他雖然和曾鞏一樣，從正統意識形態的角度批判《戰國策》，也一樣從「足以備史」的方面說明此書為什麼不可廢，但卻進一步從「文」的層面說明其特質和影響。另外，雖然李夢陽和李文叔一樣，對《戰國策》文字感染力有深刻的體會，但他卻同時把「文」這個範疇複雜化，一方面從先王制禮的必要性論文的正當功能，另一方面也從後世一味追求辭藻巧妙的流弊說明文章與世道盛衰的關係。不過不同於朱熹經學史學文學貫通而言的觀點，李夢陽在序文中雖然仍以經為正統，但他更強調的卻是不同學術的並列而非貫通。

如果我們深入剖析所謂「君子」與「述者」的差別，可再細分為「經典」、「史傳」與「文辭」三種學術取向，但在李夢陽那裡，無論哪種取向，都必須以「文」為基礎。「經典」指的是聖人載道的文本，從維護正統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是不可違背的。「史傳」是把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事記載下來以供後人參考的文字。「文辭」則是為文所須掌握的文章的形式。李夢陽在〈刻《戰國策》序〉一文中所展現的多重視角，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也就是針對「文」這一範疇的多重認識。

四、「文」的多重性及其學術史意義

李夢陽在文學史上以身為「前七子」的領袖而著稱，而按照五四以來的一般認知，前七子的文學思想一方面是進步的，另一方面卻也是保守的。在面對以臺閣體為代表的宮廷文學雍容華貴和粉飾太平，七子提倡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²³為明代文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氣象。但是，七子強調復古，最終卻走上擬古的道路，主張模擬古人的傑作，導致創作者喪失個體精神。這種二元對立的分析方式，長期以來左右著我們對

²¹ [宋]黎靖德編：〈論文上〉，《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39，頁3297。

²²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1991），頁184-185。

²³ [清]張廷玉等：〈李夢陽傳〉，《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86，頁7348。

李夢陽和被歸類於前七子陣營的文人的文學主張和創作的理解。但這樣的認識是有失偏頗的，無法為我們揭示李夢陽思想的真實內涵。²⁴

實際上，筆者認為，我們甚至不應該單單局限在我們今天所定義的「文學史」的範圍內討論李夢陽。李夢陽雖然對「文」這個概念多有闡發，但他所討論的「文」，包含我們今天所謂的「文明」、「人文」和典章制度等等，而不單單只是指文學。即便在文學的場域，李夢陽的認識也是多重的。下以李夢陽為朱應登（1477-1526）所寫的墓志銘為例：

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聘吳楚之間，歛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²⁵

這段文字顯示在 16 世紀初，一名士子所面對的幾種學術選擇。首先是以身為北方人的「執政者」所擅長的經學，其次是「柄文者」為了「取媚時眼」而作的「雕浮靡麗」的文章，²⁶最後是朱應登等人所從事的古文詞。這裡除了學術的分類，還有地域的差異。在李夢陽的論述中，北方士人重經學，因此看不起文學。值得注意的是，李夢陽本身也是北方人，但他顯然不滿意時人把文學創作視為不務實的活動。在他看來，從事詩文創作和經學一樣，是一項嚴肅的事業。但同時，他也對時下的文學潮流深感不滿，而要扭轉「柄文者」取媚時眼的創作方式，就必須復興古文詞，以古樸的語言，掃除雕浮靡麗之詞。

為什麼詩文創作是嚴肅的事業？按照李夢陽的說法，那是因為文學在道德與政治方面的作用：

觀風河洛者，為巡按譚子而作也……天下有大通焉，觀是也。有大幾焉，風

²⁴ 有關李夢陽的思想及其迴響，可參閱筆者近期的英文專著。Ong Chang-woei, *Li Meng-ya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Literati Learning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²⁵ 李夢陽：〈凌谿先生墓志銘〉，同註 1，卷 47，頁 1 下-4 上。

²⁶ 這裡的執政者指的是內閣首輔劉健（1433-1526），而「柄文者」一般以為指的是當時執文壇牛耳的李東陽（1447-1516）。

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為職者也。即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空同子曰：「士讀《易》乎？觀之為道，人己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己，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爾惟風，微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無遁情……德者所以為風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為政。」……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聲迹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觀風河洛云……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²⁷

又：

夫天下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瘠惡，湔澆而培淳，迪純以剷其駁，而後化可行也。²⁸

這兩篇文章是為慶祝譚纘（正德 12 年〔1517〕進士）巡按河南而作。因為對象是一名受朝廷之命到地方上視察的官員，本篇的主旨在於闡明詩歌在政教方面的功能。但李夢陽以「風」立論，則把詩歌和自然的奧秘（天下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萬物的特性、社會的風俗、政治的作用（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與個人的道德行為（知風之自，自我始之）聯繫起來，一環扣一環，展現詩歌的多重內涵。換言之，李夢陽對詩歌的政教作用的論述並不是單一的，平面的。相反的，他引導讀者去思考詩歌的政教功能背後各種複雜的元素，包括在他的詩學中占有關鍵位置的「音」的元素。

²⁷ 李夢陽：〈觀風河洛序〉，同註 1，卷 51，頁 10 上-12 上。

²⁸ 李夢陽：〈觀風亭記〉，同註 1，卷 49，頁 7 上-9 上。

李夢陽的文學理論主張在形式上遵循古人之法則，學界早已有許多討論，不必贅述。但正如簡錦松所言，雖然李夢陽所謂的「法」，包含詩歌創作方面的各種法則，但最重要的，當屬「音度」。²⁹確實，在李夢陽看來，詩歌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其音樂性：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嘆曰：「嗟乎！予於是知詩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庾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³⁰

詩與言的區別，正在於詩歌有音律方面的要求，也才能因此真正把人的真實情感傳達出來。缺少了音樂性，詩歌就失去應有的生命：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著，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者心暢而聞之者動也。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³¹

宋詩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只注重說理，而忽略了音律方面的追求。與前述「宋儒興而古之文廢」一樣，這段話經常被學者引用來論證李夢陽的反理學立場。實際上，如果我們仔細琢磨李夢陽的意思，就會發現他不過是想指出，在說理之外，詩歌自有其不可被摒棄的形式上的要求。雖然我們也能通過詩歌說出一片道理，但如果一名作者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說理，那他應該選擇散文而非詩歌。

²⁹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229-232。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頁152-166。

³⁰ 李夢陽：〈林公詩序〉，同註1，卷51，頁3下-5上。

³¹ 李夢陽：〈岳音序〉，同註1，卷52，頁4下-5下。

前面說過，李夢陽在使用「文」這個概念的時候，經常包含多重的意義。但在這一段引文中的「文」則是狹義的，單指散文而言。李夢陽提出「調」這個概念，說明詩與文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必須加以分別對待。

即使同是散文，我們也必須依據不同的體裁、不同的內容給予不同的處理：

昔人謂文至〈檀弓〉極，遷《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驪姬」，約而該，故其文極。如此論文，天下無文矣。夫文者，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者也。不必約，大約傷肉；不必該，大該傷骨。夫經史體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容之也，貴意象具，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類是也。經者，文之要者也，曰「安」而食寢備矣。自〈檀弓〉文極之論興，而天下好古之士惑。於是惟約之務，為湔洗，為聾牙，為剋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彷彿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³²

李夢陽從《禮記·檀弓》和《史記》對同一件事的討論，引申出經史體殊的觀察。為文者必須能「隨事變化，錯理以成章」，而不是墨守成規，盲目追求一個並不存在的普遍原理。這充分說明李夢陽論詩文創作的關鍵，就在於強調文章在形式上的多樣性。唯有正視這一點，文章才能避免扁平和單調的毛病，才能真正反映複雜多變的世界和人情。

另一方面，隨事變化也不是任意的。不管怎麼變，為文還是必須遵守某些原則和規矩，不過形式上的法則是由不同文體的特定功能決定的。這個觀點，李夢陽在討論史書的寫作事表達得最為清楚：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鬱，傳敘繁蕪，事無斷落。³³

李夢陽從「作史之義」開始，論述史學彰善懲惡的政教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筆鋒一轉，接下來通篇卻是通過對歷代正史的評判，說明史書的寫作應當如何進行，才能讓

³² 李夢陽：《空同子·論學下》，同註1，卷66，頁1上-2上。

³³ 李夢陽：〈論史答王監察書〉，同註1，卷62，頁11下-12下。

讀者一目了然。例如他說范曄著《後漢書》，「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說歐陽修「人雖名世」，然其《新五代史》、《新唐書》等巨著卻不能與古史相提並論，因為「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啟發，展卷思睡矣」。³⁴這些意見，都是針對史書的體例而發的。史的意義與功能，和史的形式，在這樣的敘述中是並行的。在史書寫作的過程中，對史之文的追求，是獨立於對史之義的闡述的。這種多層次的對史的認識，正是構成李夢陽對《戰國策》的評價的基礎。

我們從李夢陽對詩歌和史書的討論中，可見其對詩文的形式重視。當然，從形式入手對詩文進行討論和評價並不始於李夢陽，但自從宋代以來，在理學「文以載道」的大論述下，一般而言，詩文的形式總被要求為實現一個更為宏大的目的而服務。一些零星的，堅持對詩文形式的追求應獨立於對「道」、「理」等的追求的呼籲都處於邊緣，難以形成氣候。南宋的嚴羽（約 1180-1235）就是很好的例子。嚴羽在其《滄浪詩話》中說：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³⁵

當嚴羽說詩有別材別趣，非關讀書窮理的時候，他並不是在全盤否定讀書窮理的重要性，只是希望指出詩歌作為一種書寫體裁，有其獨特的靈魂。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那是忽略了詩歌形式的特質，無法令讀者聽者感動。嚴羽對「近代諸公」的批評，顯然和李夢陽批評「宋人主理不主調」十分相似，不過嚴羽在他所處的時代影響不大，他的詩學一直要到 15 世紀末才逐漸受到重視，顯示明中葉的知識界正在經歷一場變革。³⁶

³⁴ 同前註。

³⁵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 26。

³⁶ 有關嚴羽的生平、詩學和接受史，見 Richard John Lynn, "Orthodoxy and Enlightenment: Wang Shih-chen's Theory of Poetry and its Antecedents," in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ed. W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17-269, esp. 219-221. 陳伯海：《嚴羽和滄浪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21-33。李銳清：《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香港：中文大

從李夢陽對前代史書（包括《戰國策》）的評價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以形式論形式，試圖從形式上，而不是從思想內容上建立書寫的典範（當然李夢陽從來不否認文章思想內容的重要性）。李夢陽改革詩文的呼聲之所以引起那麼大的反響，甚至被總結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樣的口號，正說明李夢陽成功地把人們評論詩文的視角聚焦於文章的形式上，改變了人們塑造和評論文章典範的方式。

不過弔詭的是，或許因為持論太過，李夢陽雖然特別重視詩文體裁和形式的多元性和多變性，但諸如「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這樣的口號卻難免給人拘泥於某種特定形式，³⁷無法認識到文章的生命力恰恰是必須通過不斷的發展和變化才能體現出來的事實。因此，因襲模擬便成為李夢陽文學思想最為人所詬病的方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後來有許多人嚴厲批評李夢陽提倡因襲模擬，但他們在客觀上卻把李夢陽論詩文重視多元與變化的觀點推進一步，如楊慎（1488-約 1559）雖極力反對李夢陽等人的古文詞論述，但他所提出的「人人有詩，代代有詩」等口號，³⁸卻更為強調詩文的多元性。而作為創作主體的個人，在這樣的氛圍中愈發獲得重視。³⁹晚明文壇個體意識的張揚和性靈說的流行，從表面上看雖是對李夢陽領導的古文詞運動的反動，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他強調多元與特殊的觀點的一種繼承。

五、結語

晚明在知識界深具影響力的李贄（1527-1602）在寫給管志道（1536-1608）的一封信中說：

第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談及問學之事。說學問反埋卻種種可喜可樂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也？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世同生，一為道德，一為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談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⁴⁰

學出版社，1992），頁 1-27。

³⁷ 李夢陽：〈潛虬山人記〉，同註 1，卷 48，頁 9 下-11 下。

³⁸ [明]楊慎：〈李前渠詩引〉，《升庵集》，收入[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3，頁 32 上。

³⁹ 關於楊慎「通變」的文學觀，見孫康宜：〈走向邊緣的「通變」：楊慎的文學思想初探〉，《中國文學學報》第 1 期（2010），頁 359-368。

⁴⁰ [明]李贄：〈與管登之書〉，《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增補，頁 267。

李贄的這封回信，顯然是要阻止管志道跟他討論道德方面的學問。我們今天難以清楚得知事情的前因後果，但從管志道給李贄寫的信中，我們知道管志道對李贄視其為文人十分不滿。在管志道的自我認知中，自己的學術旨趣更接近王陽明（1472-1529）。⁴¹無論李贄對管志道的看法是否公允，他把王陽明與李夢陽、道德與文章並列，然後說明兩者自有不可磨滅的價值，擅長文章者不必同時精通道德學問的觀點，突顯的是明中後期人們傾向於把不同知識領域分別對待的現象。

李夢陽和他同時代的人在這方面可謂開風氣之先。李夢陽對《戰國策》所採取的多重視角以及他關於經史體殊的論述，實源自其強調多元與差異的宇宙觀。他雖承認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但他從「理外之事」論理，卻是對理學有關「理」的普遍論述的強有力挑戰。正因為世界是多元的，所以我們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術（道德、經學、帝王之學、文章）來理解和應對世上複雜多變的人與事。即使僅僅聚焦於文章，李夢陽也十分重視不同體裁之間的差異。為文根據不同體裁各自的特點和功能追求形式上的完善，本身就是一門獨立的，值得人們投入心力的學問，它不需要如經學般「有用」，也不必為更為宏大的理學關懷服務。我們必須把李夢陽的詩學與文論放置在明中葉以後思想界逐漸重視多元性多於普遍性的大背景下來討論，才能夠理解他不斷重申文與詩、經與史之間的差異的意義所在。

⁴¹ [明]管志道：〈答李居士卓吾叟書〉，《續問辨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卷1，頁43-4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鮑彪註：《戰國策》，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嘉靖戊子[7年]吳門龔雷覆〔宋〕刊本，1528年。
-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徐德明、王鐵校點：《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刊本，1602年。
- 〔明〕楊慎：《升庵集》，收入〔清〕紀昀、永瑤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李贄：《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明〕管志道：《續問辨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 〔明〕焦竑編：《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二、近人論著

- 余慧君、高月英、盧芹娟：〈姚宏「剡川姚氏本戰國策」版本流傳述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8期，2005年。
- 李銳清：《滄浪詩話的詩歌理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
- 孫康宜：〈走向邊緣的「通變」：楊慎的文學思想初探〉，《中國文學學報》第1期，2010年。
- 郭丹：〈怎樣讀戰國策〉，《中華讀書報》第8版，2015年10月14日。
- 陳伯海：《嚴羽和滄浪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1991年。
- 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

- ：《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 魏宗禹：〈明清時期諸子學研究簡論〉，《孔子研究》第3期，1998年。
- Ong Chang-woei, “The Principles Are Many: Wang Tingxiang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Mid-M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2, 2006.
- , *Li Meng-yang, the North-South Divide and Literati Learning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 Peter K. Bol, “Looking to Wang Shizhen: Hu Yinglin (1551-1602) and Late Ming Alternatives to Neo-Confucian Learning,” *Ming Studies*, 53, 2006.
- Richard John Lynn, “Orthodoxy and Enlightenment: Wang Shih-chen’s Theory of Poetry and its Antecedents,” in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ed. W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Wm. Theodore De Bary, *Neo-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Learning of Mind-and-He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Li Meng-yang's Preface to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Multiplic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in Mid-Ming China

Ong Chang -woei *

Abstract

Li Meng-yang (1473-1530), a leader of mid-Ming literary archaist movement, was invited in 1523 by the inspector of Henan Wang Zhen to write a preface for a reprint of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that the latter intended to publish.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reface and Li's other work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Li seems to have, on the surface, taken a moral high round and castigated the *Intrigues* for deviating from the orthodox teachings of the Classics, he preface actually encourages the readers to approach the tex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e have to situate the prefa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miscellaneous learnings" and the "learnings of the masters" in the mid-Ming period in order to appreciate its significan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Departing from the ways the Neo-Confucian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envisioned literati learning to be a focused pursuit of a grand and universal Way, intellectuals from the mid-Ming onwards began with an assumption of multiplicity and diversity and emphasized disparities among all things.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at Li Meng-yang exhibits in his preface to the *Intrigues* is a good case for showing that mid-Ming intellectuals were more inclined to see the world as complex and diverse, rather than to pursue the ideal of universality.

Keywords: Li Meng-yang, Preface of the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Multiple perspectives, Universality, D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